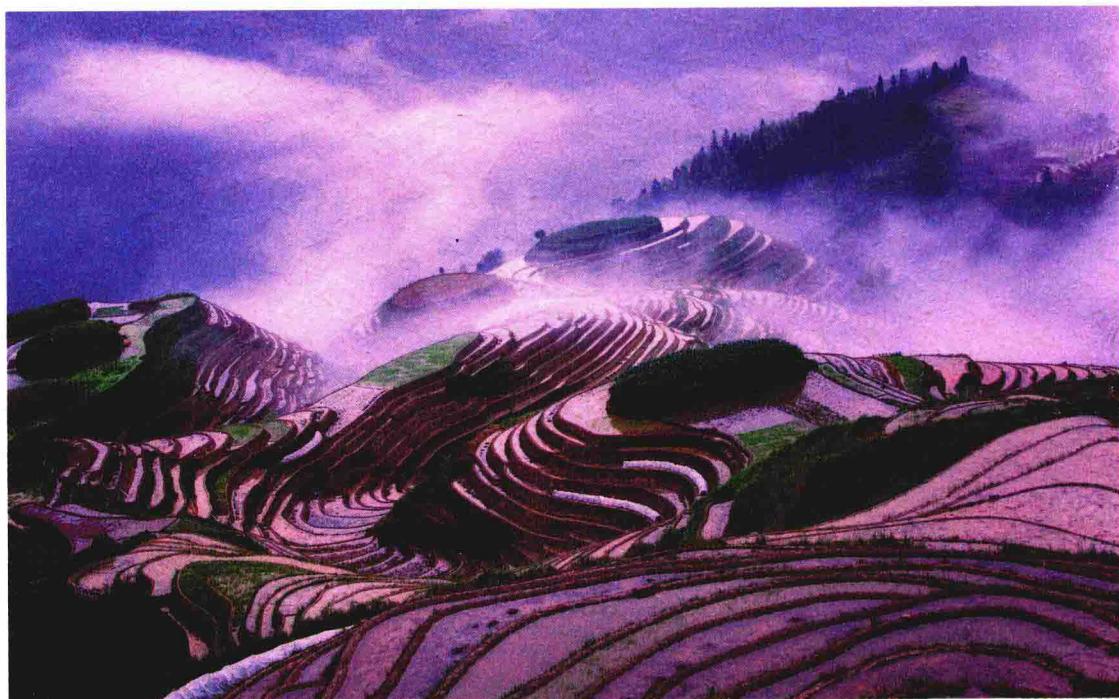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CHINESE JOURNAL OF

MOUNTAIN ETHNOLOGY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4 年卷 总第 2 期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

类学高等研

# 中国山地民族 研究集刊

CHINESE JOURNAL  
OF MOUNTAIN ETHNOLOGY

2014 年卷 总第 2 期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主编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4 年卷 : 总第 2 期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097 - 6982 - 9

I. ①中… II. ①纳… ②龙… III. ①山地 - 民族学 - 中国 -  
文集 IV. ①C95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11311 号

##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 2014 年卷 总第 2 期

主 编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编辑 / 黄金平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82 - 9

定 价 / 7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卷首语

##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 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全球化和数字化不仅给世界带来发展机会，也带来空前挑战甚至危机，环境灾变、跨国犯罪、恐怖活动、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乃至发生恶化。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多元共生、各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风险社会时代。或许正因为如此，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一经出版，便举世瞩目。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原有的概念体系已然脱离实际，需要经受生存智慧与生命智慧的拷问和纠正。我们之所以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万象关联、千灯交映的生态观，忘记了只有多样性的万物共生关联才是世界的本体之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说的“万物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显然出现了严重断裂；而我国先贤们所讲的“形”“气”“神”被分割开来——形枯，气竭，神衰。

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他关于“思维生态学”（ecology of mind）的系列论著中，曾提出“超级生态系”的观点。根据我们对其关联性模式或元模式（meta pattern）的理解，应该就是指：自然、社会和人组成一个超级生态系，在互动共生的经验上形成结构耦合，形成富于弹性的生态智慧。读过格里高利·贝特森《步入思维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lution, and Epistem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极力反对的就是那种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的笛卡尔式西方二元对立思想范式。贝特森说：“在我看来，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其焦点就在于如何重新解决肉身与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详见其女儿 Mary Catherine Bateson 整理出版的格里高利·贝特森遗著 *Angels Fear: Towards an Epistemology of the Sacred*, Hampton Press, 2004）按我们的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当代风险社会的困境在思想上就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恐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贝特森将自己在新几内亚高地（New Guinea Highlands）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过程中所获的灵感，与控制论（cybernetics）和荣格宇宙论（Jungian cosmology）的一些思想内核相结合，提出了万物相生相联的“元关联”（meta-connection）学说。贝特森的“元关联”和“超级生态系”概念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启示良多。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超级生态系；各民族之间和亲互市，互通有无，建立和发展了富有弹性、充满活力的族际生态系。要调整西方文化主导的当下世界秩序，就要借助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所拥有的智慧库。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国，这里的山地民族曾经创造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耦合发展的典范，例如苗族混农林经营、侗族“稻-鱼-鸭共生系统”、哈尼族元阳梯田、瑶族植物药浴、乌蒙山区的草山混牧耕系统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具有世界性的榜样意义，在今天这个因为忽视生态关联而风险四伏的时代，尤其值得发扬光大。为此，我们要借助新创的《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这个学术平台，特别提请学界同人关注和重视中国山地民族及其生存性智慧的研究。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把塞北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视作“大中国”的历史元话语，这对日下盛行的民族主义“小中国”的叙事，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纠正。但是，我们也要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山地民族文化在他那里是缺场的；而这一缺环正是我们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大力开展山地民族学研究去弥补之处，为我们从山地的研究视角出发实现中国学术的创新与突破留

下了广阔的空间。其实，无论是山地民族文化，还是塞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都是中国这个超级共同体的有机内核；山地文明对于定义和建设当下的多样性中国，乃是不能缺席的文明体系之一。山地民族的历史演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历代王朝的独特关系，为我们提供并丰富了多民族共建中国的大视野。从中原的伏牛山区到西北的贺兰山脉，从“回疆”到“苗疆”，从云贵山地到帕米尔高原，中国经历了从“以中土定边疆”的“同文共同体”到“以边疆定中央”的“政治共同体”的过渡。疆域如此，国体如斯。可惜我们的经济观、价值观、文化观、语言观、情感观，却不能跟进，不能与此大势交融合流。因此，我们亟须开展跨文明系统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整全分析（holistic analysis），旨在求同存异，建立普适于中国各民族的重叠共识。

中国文化的象征体系，不能只有炎黄而没有蚩尤，不能只有泰山而没有高黎贡山，不能只有秧歌而没有享誉全球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或苗族飞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只有建立在“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之上，才具有厚实可靠的基础。因为，毕竟有多样才会有认同，有差异才需要有认知，有认知才会有比较，有比较才会有意义。“和而不同”是我们的生活常态，“美美与共”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山地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要受到国家法律和政治上的保护，要有相应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举例来说，苗侗语言不仅不会和国家通用语言发生冲突，反而会补充后者的“空白”，交流情感，维系乡情，传承知识，丰富智慧，提升哲理，增加自尊。走出苗乡侗寨，国家通用语朗朗上口；回归故里，“乡音未改”，亲情浓稠。山地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文字、民俗事象、社区管理机制、民间知识与技艺等，随时提醒我们不要那么“文化自我中心”，不要那么惧怕多样性，不要在扶手椅上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去这化”“去那化”，不要未经深入田野就那么“确定无疑”。希望本期集刊发表的论文能够有助于扭转我们以往对于山地民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或可能的误读，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山地文明及其丰富多样的内涵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成立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极力倡导中国山地民族的综合实证研究，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多元一体超级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山地文

明认知缺环，重构我国山地民族文明与中国文明复合系统乃至世界体系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山地民族、山地社会与山地生态之间的元关联。中国的山地民族有诸多的文化奥秘有待我们去揭示，他们基于生态关联的生存性智慧需要我们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去发掘和弘扬。例如，苗族三元论生存哲学强调动态，强调配合，强调关系：物质、能量、结构三元组合是事物的基础，它们之间存在互生相克的共生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它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配置，让事物能够“生于能量，基于物质，寓于结构”。在侗族的生态世界，鸭叫鱼游，禾苗青青，稻、鱼、鸭、人组成共生系统，构成物质与能量的良性循环，是一个多渠道、自循环的网络。侗族人能够很好地把握“稻—鱼—鸭”的相克相生规律，巧妙利用各种生态条件和动植物习性，建设良性持续的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智慧渗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系统中，促进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体现了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共生，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能动性”（agency），凸显了主体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对于这样的山地民族文化系统，只有从“形”“气”“神”耦合同体的整全分析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机理和精髓。

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不应囿于学科分野的壁垒，将文化整体肢解为见木不见林的片面认识；而应该在认知、学术和思想上重新把“形”“气”“神”勾连起来，让天地重新相接。正如贝特森的学术灵感来自大洋洲的新几内亚岛国高地，马图拉纳（Humberto R. Maturana）和瓦列拉（Francisco Javier Varela）的“自创生系统与认知”（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思想缘于智利的安第斯高原，霍林（C. S. Holling）的 Resilience 理论成长于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名为 Obergurgl 的奥地利山村，我们深信中国丰富多彩的山地和蕴藏在大山里的山地民族本土智慧必将赐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学术思想源泉。依托全国第一家专门致力于山地民族研究的学术合作平台——“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我们的山地民族学研究将奠基于贵州，植根于西南，生长于中国，结果于亚洲，收获于国际；我们要追求本土化、跨学科、国际性，动员诸多领域在学术上共同“致富”。通过积极推动山地混农林文明和草山混牧耕文明的深度研究，并大力倡导山地文明与草原文

明、平原农耕文明、海洋文明的比较研究，我们旨在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共同体、协商中和的智慧共同体以及“形”“气”“神”三通的生态共同体和美美与共的美德共同体。愿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在各位同人学者的扶持下，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动山地民族学的发展，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整全合一的跨界关联。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卷首语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

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 1

**山地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与创新**

费孝通关于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 李明华 / 3

“饮酒歌唱”与“礼失求野”

——西南山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义 ..... 徐新建 / 14

中国山地民族的混农林复合文明及其生态价值 ..... 胡展耀 / 43

湘黔桂边区三省坡侗族文化走廊夹缝中的“花苗”

语言与文化 ..... 石 林 / 52

蒙古草原上的山地文化

——内蒙古图什业图奎屯罕山祭祀的民族志报告 ..... 阿拉德尔吐 / 79

**山地民族生物多样性与资源利用**

麻山苗族三大支系植物观念及利用方式比较研究 ..... 吴正彪 / 91

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特种经济动物资源保护

利用研究刍论 ..... 韩宝银 郭玉红 / 116

性别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

——西部山区农村妇女在自然资源管理中面临的挑战 ..... 黄 晓 / 128

农业生物多样性脉络中的侗语糯稻名物系统

——兼论开展中国山地民族名物学研究的

意义 ..... 龙宇晓 石 林 潘永荣 / 138

清代滇东北矿区周边的物种与生态变迁 ..... 耿 金 / 155

## 山地民族文献遗产与社会记忆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风俗志》的民族

民俗学价值 ..... 刘海涛 / 175

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价值及俗字成因考析 ..... 魏郭辉 / 184

兄弟的隐喻：中国西南山地民族同源共祖神话探讨 ..... 高 健 / 195

侗族俗文学：山地民族的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 ..... 袁 武 袁仁琮 / 206

## 山地民族开发史

晚清云贵高原矿业发展的近代化尝试

——东川铜业个案研究 ..... 凌永忠 / 221

西南联大师生在环滇池地区的土地开发 ..... 杨海挺 / 239

清代贵州“苗疆”义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 于晓燕 / 253

## 世界山地文明比较研究

走上国际山地民族学研究基础建设的新台阶

——贵州师范学院海外苗学文献整理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龙开义 / 267

东南亚高地两种苗文系统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兼及对詹姆斯·C. 斯科特 Zomia 文字观的

反思 ..... 蒙昌配 龙宇晓 / 281

# **山地民族文化多样性 传承与创新**



# 费孝通关于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李明华\*

**摘要：**费孝通先生一生致力发展山区社会与经济，强调通过社会实际调查对山区进行社会人类学深入研究，他的许多学说对我 国贫穷集中而又生态环境脆弱的山地社区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尤其是费孝通先生在分析山区生态与人文失衡现状及社会原因的基础上，主张根据各不同类型山地社区发展的经验进行人文生态思想的改造，建立新型山区人文与生态的和谐关系，这对我们深入开展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有着指引性的意义。

**关键词：**费孝通 山区发展 社会人类学 人文生态观

费孝通先生 1935 年深入广西瑶山的调查立下了社区研究的基石。43 年后四进瑶山，并把瑶山的研究拓展到武陵山、太行山、沂蒙山、南岭山区和大兴安岭。1991 年以来，确定了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研究计划。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与山区社会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中，围绕山区发展这个主题阐述了人口分布、人口素质、社会结构、社区变迁等问题，中心问题是山区的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协调发展。这对于我国贫穷集中而又生态环境脆弱的山地社区发展而言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

\* 李明华，湘江临安人，浙江农林大学教授、法政学院院长，主要从事山区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

## 一 费孝通先生的类型比较观

费孝通先生早期所做的瑶族调查就是运用社会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进行文化比较的尝试。他的《江村经济》一书得到了英国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 B. K. 马林诺夫斯基的赞赏：“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有一些杰出的优点，每点都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sup>[1]</sup>。不仅如此，他的《乡土中国》《美国人的性格》《生育制度》等著作，都渗透了比较思想。因此，他在 1983 年 6 月所写的《盘村瑶族》序中提出，社会学或民族学工作者“必须从解剖麻雀入手，树立类型，进行比较，明确特点，发现共性”<sup>[2]</sup>。他认为他的这个认识过程是以“从个别出发可以接近整体”的观点来进行的。他在山区社会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正是这种类型比较方法。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得到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但他个人认为这并不能代表中国农民生活的全貌。他说，“将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中国农民，那是错误的。但是将一个农村看成一切都与众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也是不对的”<sup>[3]</sup>。为此，他在云南内地挑选了 3 种不同类型的山地农村社会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成果体现在 1945 年出版的《云南三村》一书中。在这时，他提出了形式概念，后来概括为类型概念。他的类型概念是以“一切事物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为前提。因此“相同条件形成的相同事物就是一个类型”<sup>[3]</sup>。

费孝通先生在 1982 年以后开始从农村的研究延伸到集镇研究，他对小城镇的研究提出了“类别、层次、兴衰、分布、发展”的 10 字研究科目。这里所运用的仍是原有的“类型”概念。1986 年在温州考察时，费孝通先生认识到，地区间的区别可以出于客观条件不同而所走的路子也不同，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这个概念就“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

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sup>[4]</sup>。发展模式的概念不仅包含静态意味，也包含动态意味，因为模式适应的条件是变化的。费孝通先生认为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是有利于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模式的比较必须防止偏重于各模式之“异”，而忽视其所“同”。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共同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的前进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农经济，同一目的是脱贫致富振兴中华。<sup>[4]</sup>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开始关注我国东西差距这一大问题，开始边区研究。在边区研究的过程中，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概念。他说，“我在看到沿海和边区的农村发展的差距时，对全国经济这盘棋的格局有了初步的综合印象，那就是经济水平由西向东阶梯形的上升和现代工业由东向西的逐步延伸。进一步考察，我看到这个经济阶梯正表现在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镇的规模和密度上的差别”<sup>[4]</sup>。正是这幅画面，促使费孝通先生从比较农村发展路子的模式研究，更上一层楼，探讨区域发展的问题，注意发展的空间格局。

也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费孝通先生在 1991 年开始了以发展山区经济为重点的研究计划。<sup>[4]</sup>首先走访了四川、云南两省的大小凉山，提出“点一线一面”的发展方针。并且“为了想多熟悉一些发展上困难较多的山区经济情况”，继访问大小凉山以后，又访问了中部的武陵山区，“看到了各个山区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因而想去访问一些比较发达的山区，看看有没有值得推广的好经验”<sup>[5]</sup>。后来到了山东的沂蒙山区，考察了一个贫困山区是如何从小农自给经济走向开放的商品经济全过程。连同他以前所认识的大小兴安岭、南岭山脉、甘南山区，形成一个对山区发展的整体认识。结合各地山区发展的实际，提出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

从上述回顾和阐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对山区社会的研究，是费孝通先生晚年学术生涯中所潜心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从早年对广西瑶山的调查到晚年的山区发展之梦，可以说山区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虽然在这中间开展了各种不同类型地域社会的研究，如小城镇、城市群、边区和草原，也包括欧洲风情与文化的考察，但落后山区的发展仍然在他的心目中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也正是在与不同地域社会的比较研究中，才更加

凸显出山区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与他一生“志在富民”的拳拳之心是一致的。

从比较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的角度看，费孝通先生对山区社会的研究有这样一些观点和方法值得我们重视。

(1) 费孝通先生通过社会类型的比较，确认了山区社会是一种典型的地域社会。如前所述，从时间过程看，在分析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东西差距过程中，提出把山区发展的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因此，山区的问题是全国经济一盘棋的空间分布格局下一个特殊的问题。从理论上看，山区社会也是有别于平原农村，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结构的典型社会。这个典型社会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社会，从生产结构到社会文化结构整体上呈现出落后的特征；同时，这个典型社会在我国又多是多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山区的问题和民族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山区社会又不能简单地和民族社会相等同。他在《盘村瑶族》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研究工作的方法上说从按民族的单位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已经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因而我曾主张今后这类研究应当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就是以地区为研究对象进行综合调查。”<sup>[6]</sup>从中可以看出，费孝通先生运用社会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是把山区社会作为一种典型的地域社会来看待的。

(2) 费孝通先生通过不同的山区类型的比较，来全面把握山区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如前所述，费孝通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中走访了各种不同条件的山区。在这其中，有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有汉族文化为主的山区；有内地封闭落后的山区，也有沿海开放发达的山区。为此，他采用擅长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同的类型与区域经济模式，如以工业下乡、个人奋斗与集体立功相结合的罗社模式，有以商促工的临沂之路，更有茶马互市的临夏经验等。在另一方面，费孝通先生认真指出，深山远林、凭险自保的山区免不了“在经济上停滞落后，在文化上闭塞保守”。山区要发展，必须搞活流通，因地制宜，把资源优势转变为商品经济优势。

(3) 费孝通先生强调要把静态的社会结构比较与动态的社区发展结合起来，要把山区社会特征的客观揭示与山区农民致富的价值目标统一在一

起。应该说，费孝通先生早期的大瑶山调查，所做的是文化比较的工作，后来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强调文化结构的变迁路径研究。特别强调在文化变迁过程中，农民的本土文化和外来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如果说，他早期的形式和类型等概念，仅仅是包含文化在内的社会结构特征静态层面的比较的话，他后来提出的发展模式、区域发展的概念更是超越社会结构比较的静态意义，而进入山区发展过程规律的研究。这种结合与转变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借鉴的。

## 二 费孝通先生山区自然生态与 人文生态的平衡观

### (一) 人文生态概念的基本含义

费孝通先生在很多著述中给定了人文生态概念的基本含义。他说，“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和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间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他在《定西篇》作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人文生态即指“社会劳动力，据其所处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它达到的智力水平，形成何种生产结构以达到最高生产率，以及劳动力的组织形式和劳动成果的分配形式等达到最佳配合的历史进程。说通俗一点，就是人们干什么更为有利？怎么干才最有效？”<sup>[7]</sup>他以人文生态的观点分析山区农民的游耕方式，更为具体地表明了这一概念的内容。他说：“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生活。它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经济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sup>[2]</sup>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文生态这一概念具有三层含义。

(1) 它是生产方式概念的具体化。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人文生态概念则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条件下表征具体的生产技术、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综合概念。涉及的要素比生产方式多样而又具体。

(2) 它是一种具体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这种结构以人与自然的协